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 现状评估与努力方向*

曾向红

【内容提要】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17年来，实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然而，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并未在理论创新上取得明显进展。与之相反，国内外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描述性研究，学理性研究成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创新程度也有待提高。大体而言，要实现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可从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等方面入手。相对而言，概念创新是一条难度较小且更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鉴于学术概念创新具有自身的提出路径和逻辑理路，在此过程中学术界需要注意的是，要使提炼出的学术概念能有效反映上海合作组织在实践层面的创新；在避免简单模仿的同时，要体现出独创性，并使提出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学术概念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之后，政界有必要对学术概念的创新予以必要的支持。此外，本文结合上合组织发展的历程，尝试性地提出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可被视为一种“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该概念不仅能较好地总结上合组织在实践方面的创新，而且可以运用到对其他地区合作组织的分析中。至于如何基于这一概念实现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学术界可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或研究。

【关键词】 上海合作组织 国际关系理论 地区合作模式 区域与国别研究

【作者简介】 曾向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VDL003）与2018年度新疆智库项目“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与‘一带’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世界秩序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6LZUJBWZY001）的资助。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①。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如此表述上海合作组织(下称“上合组织”)与国际关系理论、实践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厘清上合组织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实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有助于明晰上合组织运行的实践与学理意义,也有助于明确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学术研究的努力方向。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若上合组织的确超越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那么有待明确回答的是,上合组织是如何实现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的。鉴于篇幅,本文将着重分析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首先厘清“上合组织的理论创新”与“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之间的区别;其次简要分析国内外学界在上合组织研究中理论创新的基本状况及其不足;最后从概念创新入手,尝试性地提出有助于推进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的建议。

一 “上合组织的理论创新”与 “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之间的差异

上合组织从一个初生时被西方视为“清谈馆”与行动效率屡遭外界质疑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已发展成为维护欧亚地区和平与稳定、涵盖世界近40%人口的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新型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所走过的道路虽不乏崎岖与坎坷,但终究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与行动效力,并取得了不少可观的成就。上合组织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其在实践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重要创新,包括创建模式、指导理念、成员构成、运作方式等方面^②。事实上,经过17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展示出了一种区域合作新模式。在理论或理念创新方面,上合组织同样实现了重要进步。如“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或理念的提出,就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或创新。其中,“上海精神”“新安全观”的提出较早,它们构成了指导上合组织初期建设和运行

^①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10日,青岛)》, https://www.sohu.com/a/234971528_100184122

^②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曾向红:《上合实践: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 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rdzt/2018shzz/pinglun/201806/t20180611_800132515.html

的重要理念；“亚洲安全观”于2014年5月由习近平主席提出，上合组织成为中国践行亚洲安全观的重要平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则是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提出的用以指引上合组织运行的崭新概念。

“上海精神”与“新安全观”是上合组织对国际关系理论较早的创新。在上合组织成立之时，“上海精神”与“新安全观”就已被提炼为该组织运行的指导理念和安全合作实践的思想基础。在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峰会上，江泽民指出：“‘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它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首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它所培育出来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不仅是五国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随后，“新安全观”也得到进一步的提炼与完善。2002年6月上合组织圣彼得堡峰会发布的《元首宣言》指出：“国际社会须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相互协商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这有利于彻底消除安全破坏因素和新威胁的根源。”^②

“亚洲安全观”与“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则是中国领导层在上合组织度过初创阶段后提出的用以指导组织运行的新理念。十几年来，“上海精神”一以贯之，但用以指导该组织安全合作的“安全观”则有所更新与完善。如在此前“新安全观”的基础上，中国又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并使上合组织成为践行该理念的重要平台。按照中国领导人的理解，“亚洲安全观”不仅与“上海精神”一脉相承，而且是对此前“新安全观”的更新。2014年9月12日，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坚守合作共赢理念，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集体之力、团结之力、合作之力，携手应对威胁挑战，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得到更大发展。”^③关于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则指出：“‘上海精神’是我们共同的财富，上海合作组织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继续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济，精诚

① 《江泽民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讲话（全文）》，<http://news.sina.com.cn/c/277991.html>

②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2002年）》，<http://chn.sectsc.org/documents/>

③ 《凝心聚力 精诚协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9/12/c_1112464703.htm

合作，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①

毋庸置疑，“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不仅为上合组织探索新的地区合作模式提供了理念指导，而且丰富了国际关系中维护地区安全、推进地区合作的经验。就此而言，这些概念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创新。事实上，国内学术界大体也是如此理解和讨论这些概念的。不过，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在经过严密的学术论证之前，“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仍属于政治术语，而非学术概念。这是因为，它们并非学术界围绕上合组织的发展过程、运行特点、合作模式等提炼出的、具有明确内涵或外延的学术概念。迄今为止，人们似乎更多地是在论证上述概念提出的政治或学术价值，而不是提炼这些概念所具有的学术内涵，或者根据这些概念发展出一套逻辑严密、具有解释功能的理论体系。因此，如何围绕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提炼出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能有效解释上合组织发展动力与轨迹，并能推广至其他地区性合作组织的理论范式，学术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这里，就“上合组织的理论创新”与“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作出明确的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前者而言，我们主要是指组织本身的实践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否定或超越；而后者则是指研究者基于对上合组织实践过程的考察，就此提出新的学术概念或一套有关国际组织或国家间合作的新理论体系。诚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上合组织的发展过程实现了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超越，这是就上合组织的理论创新而言的。而就上合组织的研究而言，要实现理论的创新，需要学术界围绕上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提出崭新且得到认可的学术概念或理论学说。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可以说上合组织的平稳运行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同样实现了对上合组织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般而言，要实现对某一问题研究的重大理论突破，至少要在学术概念的提出或理论学说的构建上取得重大且公认的进展。但是，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事实上，理论学说的构建，往往包括了新的学术概念的提出。换言之，学术概念的创新，往往只是理论创新的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考虑到目前学术界关于上合组织的研究不尽如人意，以及理论创新较概念创新难度更大的现

^①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10日，青岛）》。

实。因此，为了较快地实现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我们可以尝试从概念创新入手，如此有望较快地实现突破。下文将进一步厘清学术概念或理论学说的内涵。

首先需要承认，人们在学术概念与政治概念之间作出截然不同的区分是有问题的。如“软实力”概念最初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存在的，随后被政治家们广泛接受，这一概念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话语，但并未改变其作为学术概念的特点。又如“国家利益”的概念，尽管人们很难确切地追溯其来源，但英国帕雷斯顿勋爵的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作为对“国家利益”的经典表述，带来了“国家利益”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风行，这是政治概念演变为学术概念或是两者难以明确区分的典型案例。换言之，政治概念与学术概念之间能够相互转化，关键的区别在于政治术语的学术价值能否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对于上合组织而言，如果学术界能就“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概念作出具有深度和有说服力的论证，那么它们无疑是可以成为学术概念的。

至于理论学说，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对现实世界能否作出恰当的解释、能否提出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假设。如盛行于西方学术界的“民主和平论”或“文明冲突论”，尽管人们指责这些理论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影响甚至误导，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说至少具备科学理论的外貌。西方学者界定这些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并使用科学研究方法（定性或定量）对其中蕴含的学术假设进行科学检验。人们可以质疑其价值观预设或理论假定，但要证伪或抛弃这些理论，仍必须遵循科学程序予以批判，如此这种质疑或批判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接受。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是学术界就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发展经历所提炼的“东盟模式”（ASEAN Way）概念。同样是基于亚洲经验发展出来的地区合作模式，“东盟模式”被国内外学术界详加讨论，甚至被认为是有别于欧盟的一种独特的地区合作模式^①。与之相较，尽管上合组织在地区合作的实践方面有许多新的创建，然而，截至目前，学术界并未就此提炼出类似的“上合模式”（SCO Way），更不用说创造出得

^①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与“东盟模式”》，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三章；Amitav Acharya，“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 – 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 – 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1997, pp. 319 – 346; Mely Caballero – Anthony, *Reg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Beyond the ASEAN Wa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Mikio Oishi, eds., *Contemporary Conflicts in Southeast Asia: Towards a New ASEAN Way of Conflict Management*,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Singapore Pte Ltd, 2016, etc.

到学术界热烈讨论或广泛认可的理论模式。尽管现有研究成果似乎并未实现对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实现上合组织真正的理论创新是不可能的。在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国内外学术界就上合组织的研究在理论创新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二 国内学术界对上合组织进行理论研究的状况

对学术界围绕上合组织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扼要考察，可以发现学术界在上合组织研究上尚未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对于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国内外学术界并不乏相应的研究成果。除了难以精确统计的学术论文，国内外学术界已出版了不少专门分析上合组织的专著。大体而言，由于该组织与中国周边、多边外交息息相关，国内出版的专著远多于国外学术界^①。至少就英语学界而言，虽然学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李钢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加速推进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潘光、胡键：《21世纪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综合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张宁：《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职能》，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马振岗主编：《稳步向前的上海合作组织——专家学者纵论SCO》，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邢广程、孙壮志主编：《上海合作组织研究》，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李敏伦：《中国“新安全观”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崔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郑雪平：《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余建华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肖德：《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阿布拉等：《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研究》，中国大地出版社2009年版；朱新光：《上海合作组织视角下的中亚地区治理理论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须同凯编：《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刘振林：《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研究》，中国商务出版社2010年版；李葆珍编：《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阿不都热合曼·卡德尔：《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法律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姜大为、侯鹏：《十年风雨的上海合作组织》，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杰：《反恐国际警务合作：以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合作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段秀芳：《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王健：《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研究：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潘光主编：《稳步前进的上海合作组织》，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雪合来提·马合木提编：《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济联系的数量分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编著：《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环境保护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张耀：《中国能源安全与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张宁、杨正周、阳军：《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与中国粮食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王海运：《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徐雅雯：《上海合作组织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连雪君：《“一带一路”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制度研究——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上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心：《上海合作组织15年：发展形势分析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国冬梅、王玉娟、张宁：《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和国别环境保护研究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李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能源合作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除了上述专著，国内有关机构还出版了不少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发展报告，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术论文不少，但集中研究上合组织的专著并不多见^①。而就目前已出版的国内外专著而言，它们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发展动力、机制建设、合作领域（包括经济、安全、法律、能源、环保、人文交流等）、发展方向、指导理念、与中国外交之间的关系、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等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且全面的分析，这对人们及时、有效地把握该组织所取得的重要成绩及其演变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体而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上合组织的专著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尽管研究主题丰富多样，但大多数专著都属于介绍组织发展成就与不足的描述性研究，较少对上合组织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②。换言之，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将上合组织定位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强调其践行了新的安全理念或开创了地区合作的新范式，并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主导作用使其成为两个大国外交实践中的重要内容，等等。此类观点的确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国内外学术界较少从理论角度揭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也就是说，国内外学术界就上合组织作出了许多论断，但缺乏关于这些论断的学理论证。

如就上海合作组织的性质而言，该组织不仅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也是中俄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然而，学术界却很少运用国际机制理论或多边主义学说，来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大国在组织内的互动、中俄互动对组织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分析。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作为区域研究对象之一的上合组织与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之间是脱节的。简而言之，在目前的研究中，上合组织的发展及其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特殊和孤立的国际现象，从而限制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深度。这种状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在学理层面，由于未能意识到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所具有的普遍性，故不利于学界提炼

^① Michael Fredholm, e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Eurasian Geopolitics: New Directions,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13; Thrassy N. Marketos, *China's Energy Geopolitic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L. C. Kumar, Delhi: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Eurasian Security through Cooperation*, Shipra Publications, 2010; Weiqing, Song, *China's Approach to Central Asi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Stephen Aris, *Eurasian Regionalism: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Oksan Antonenk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nd Central Asia's Security Dilemma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etc.

^② 如朱新光：《上海合作组织视角下的中亚地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王健：《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研究：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连雪君：《“一带一路”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制度研究——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Michael Fredholm, e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Eurasian Geopolitics*.

国际组织发展的“上合组织经验”，进而与学术界的国际组织研究进行深入对话，甚至修正西方关于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多边主义、地区一体化的既有理论；在政策层面，忽视对上合组织的学理研究容易导致学术界开展重复研究，从而生产出诸多低水平研究成果，这不利于决策者和人们深入把握上合组织的发展成效及其面临的挑战，同时也限制了相应政策建议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对上合组织进行理论性研究与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同等重要，这也是国内学术界应该努力的方向。上文对现有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专著的评价，并不是说不能对上合组织进行描述性的研究，相反，这种研究不仅需要，而且非常重要，这是人们恰当理解上合组织发展轨迹的前提；需要强调的是，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人们了解社会和政治现象提供科学知识，那么，推进对上合组织的理论研究或许是中国学者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重要途径之一，毕竟上合组织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所指出的，上合组织“构建起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及其实践过程“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献”^①，那么，学术界有必要阐明上合组织是如何实现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的，而在完成这一任务之前，至少需要对上合组织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实践问题进行理论解释，进而阐明上合组织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对既有国际关系实践和理论的创新。

三 英语学术界对上合组织进行理论研究的状况

与之相较，尽管国外学术界同样未能根据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提炼出新的理论学说，但他们在提出与之相关的学术概念方面却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面。与国内学术界著作频出相比，国外学术界较少有研究上合组织的专著。但在学术论文方面，英语世界刊发的相关论文数量却相当可观。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有别于国内学者的学术观点，其中一部分论文还尝试根据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概念。如史蒂夫·艾利斯与阿格

^①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10日，青岛）》。

拉亚·斯内特科夫从批判地缘政治学和话语分析的角度，剖析了上合组织对自我/他者身份的构建方式，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上合组织的“地缘政治身份”（geopolitical identity）^①。又如马克·兰特根通过考察上合组织成立五年以来在欧亚地区安全合作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认为上合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如果上合组织“自信持续增长，并且将其影响力拓展至原初使命范围之外，那么它将成为一个演变中的地区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②。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安全共同体”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将上合组织视为一个“安全共同体”是一种创新。最关键的是，兰特根早在十多年前即提出了上合组织可能向“地区共同体”演变的趋势，这与习近平主席2018年提出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观点遥相呼应。又如澳门大学的宋伟清，通过将上合组织置于中国周边外交及多边外交中进行考察，并深入研究了中国在上合组织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中国在组织中扮演了“外交领导权”（Diplomatic Leadership）的观点^③。另外，也有学者根据中国参与上合组织的建设、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欧亚经济联盟和东盟的对接等活动，认为中国正在推动一种“中国式的地区主义”（Chinese Regionalism）或“新地区主义”（New Regionalism）的地区合作模式^④。诸如此类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明确上合组织在地区合作实践方面的创新，而且其提炼的学术概念或理论观点也能为国内学者构建关于上合组织的理论模式提供启发。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其持有的意识形态偏见，给上合组织贴上了许多并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标签。这些围绕上合组织经验或实践创造出的概念，首先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并作出适当的回应。这类概念，除了上文提到的“东方的北约”、

① Stephen Aris and Aglaya Snetkov, “‘Global Alternatives, Regional Stability and Common Cause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West,”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4, No. 2, 2013.

② Marc Lanteigne, “‘In Medias 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s a Security Community,” *Pacific Affairs*, Vol. 79, No. 4, 2006, pp. 605–622.

③ Weiqing Song, “Peaceful Rise from the Border: Chinese Practice of Diplomatic Leadership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doi/abs/10.1142/9789814287678_0003; Weiqing Song, *China’s Approach to Central Asi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④ Tatyana V. Kolpakova and Tatiana N. Kuchinskaya, “China’s ‘New Regionalism’ as a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An Example of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l Nakhla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No. 5 (Special Issue), 2015, pp. 109–115; Scott Blakemore, “Chinese Regionalism: China’s engagement with ASEAN and SCO,” *Culture Mandala: The Bulletin of the Centre for East–West Cultur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 11, No. 1, 2014, pp. 22–28.

上合组织是“清谈馆”，还包括部分西方学者出于偏见赋予上合组织的一些学术标签。如有学者基于其信仰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民主和平论”等学术观点，认为上合组织是由同类国家组成的“独裁国家联盟”（League of Autocracies），这种联盟类似于欧洲王朝大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组建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其目的在于各国协同一致抵御西方国家推进民主的国际压力^①。基于其偏见和反感，甚至还有学者将上合组织贴上了“邪恶轴心”（Evil Axis）的标签^②。也有学者基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参与合作时获益动机强烈而规范动机较弱的认知，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仅仅根据物质激励或利益趋同而进行合作，从而导致组织凝聚力较弱和规范内化程度较低。在他们看来，上合组织等地区性国际组织不过是“权宜联盟”（Axis of Convenience）或“麻烦联盟”（Axis of Inconvenience），与真正的地区共同体相距遥远^③。还有学者认为中亚地区存在各种地区合作组织（包括上合组织），由于中亚各国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不愿意让渡国家主权，故它们只乐意采取最低程度的一体化措施推进国家间合作，在尽可能获得地区合作收益的同时有效避免外部干预。由此，中亚国家参与的地区合作呈现出“虚拟地区主义”（Virtual Regionalism）、“保护性一体化”（Protective Integration）、“昙花一现的地区主义”（Ephemeral Regionalism）等现象^④。尽管上述研究就上合组织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或观点，其中一些研究也试图从学术层面厘清相关概念，但大体而言，他们往往基于自身所持有的价值判断对上合组织予以指责，或是基于上合组织发展的某一个侧面作出以偏概全的判

^① David K. Schneider,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league of Autocracies?” *American Diplomacy*, 2008, <http://go.galegroup.com/ps/anonymous?id=GALE%7CA187797711&sid=googleScholar&v=2.1&it=r&linkaccess=abs&tissn=10948120&p=AONE&sw=w>; Jan Arno Hessbruegge,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 Holy Alliance for Central Asia?” *The Fletcher School Online Journal for issues related to Southwest Asia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 Spring 2004, <http://fletcher.tufts.edu/~media/Fletcher/Microsites/al%20Nakhlah/archives/pdfs/hessbruegge%202.pdf>.

^② Albrecht Rothacher, “Allying with an Evil Axis?” *The RUSI Journal*, Vol. 153, No. 1, 2008, pp. 68 – 73.

^③ Nicola P. Contessi, “China, Russia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SCO: a Tacit Deal Scenario,” *China &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 8, No. 4, 2010; Graeme P. Herd, “The Future of the SCO: An Axis of Inconvenience?” <http://www.risingpowersglobalresponses.com/wp-content/uploads/2014/02/HerdPaper.pdf>

^④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 2, 2008, pp. 185 – 202;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and Protective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Anita Sengupta and Suchandana Chatterjee, eds., *Eurasian Perspectives: in Search of Alternatives*, Shipra Publications, Kolkata, India, 2010, pp. 29 – 48; Niklas Wirminghaus, “Ephemeral Regionalism: The Proliferation of (Faile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itiatives in Post – Soviet Eurasia,” in Tanja A. Börzel, Lukas Goltermann, Kai Striebing, eds., *Roads to Regionalism Genesis, Design, and Effects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25 – 44.

断，其学术价值有待商榷。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关于上合组织的学术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相对而言不如国内学术界那么丰富，但其中部分成果创新意识较强、理论深度相对较高却值得国内同行们学习。在这些具有较高学理程度的成果中，有部分成果不乏进行概念创新的尝试。当然也需要指出，不是所有提出创新性学术概念的成果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因为部分学术概念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和主观臆断。对于这些成果，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批判。而对于那些真正有助于揭示上合组织发展动力，有助于人们理解上合组织发展独特性与普遍性的英文学术成果，我们则可以参考，必要时还可以借鉴。这类成果所具有的理论素养和体现出来的学术创新意识，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事实上，丰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知识储备，增强研究过程中的创新意识，增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对话能力，是我们实现关于上合组织研究理论创新的必经之路。

四 学术概念创新：实现上合组织研究理论创新的可行路径

通过上文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从纯粹学术意义而言，实现对上合组织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我们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事实上，理论创新进展缓慢，不仅仅是上合组织研究的状况，也是整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如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呼吁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由来已久，但除了近年来秦亚青提出的“世界政治关系理论”、唐世平构建的“国际政治演化理论”以及阎学通倡导的“道义现实主义”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的构建方面仍未达到百家争鸣的程度^①。而上合组织的研究，作为一种涉及国际组织研究（上合组织首先是一种区域性国际组织）、外交研究（与中国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有关）、国别区域研究（涉及俄罗斯与中亚，扩员后拓展到南亚）的多元化议题，其性质虽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同样面临理论构建能力不足的尴尬局面。不仅中国学者并未围绕上合组织发展出新的理论范式，国外学者同样未能实现这一点。然而，考虑到上合组织与中国周边、多边外交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该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

^①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董杰旻、朱鸣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的地区性国际组织，这种相关性要求我们加快理论创新的步伐，争取尽快实现关于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突破。即便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但我们至少可以提升上合组织研究的学理化水平。

根据目前学术界对上合组织相关议题的研究现状，大致可以判断，在学术层面实现对上合组织的重大理论创新仍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在此背景下，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对上合组织的整体研究水平，尤其是理论研究水平。在此问题上，西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能提供一定的启示。尤其是西方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地区合作理论的熟稔，为他们将上合组织置于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等国际现象中予以研究提供了帮助，尤其是对上合组织与欧盟、东盟等进行比较，进而发现上合组织的独特性及与其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共通性奠定了必要基础。西方研究者所具有的理论素养和对比较案例分析、过程追踪等科研方法的使用，是他们进行学术概念创新的基础。而在国内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多为描述性的，其典型特征是将研究的眼光只对准上合组织进行集中研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增进人们对上合组织的认识、为促使组织平稳运行建言献策的前提；然而，仅仅着眼于上合组织，容易将该组织的演变视为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缺乏比较的视野会限制对该组织普遍性的认识。再加上部分研究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陌生和科学研究方法的隔膜，因而难以将关于上合组织的实践知识上升为一般性知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评价绝非是对国内学术界的苛责或是对关于上合组织描述性成果的轻视。需要强调的是，积累更多关于上合组织的实践或特殊知识是实现关于概念或理论创新的前提；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将在上合组织作为一个普遍现象进行研究，这是推动上合组织研究取得重大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既然重大理论创新仍然遥远，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提高上合组织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推动实现这一目标可以有多种方式，比如呼吁研究者们拓展上合组织的研究议题，加大对上合组织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强对研究人员基础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在成员国境内开展更多的田野调查工作，构建涵盖各成员国相关研究人员定期就上合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交流的学术交流平台并推动形成学术共同体，建立对优秀科研成果进行奖励的机制，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激励更多的研究人员进入上合组织研究领域，使他们有志于推动上合组织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而且有助于为研究人员的相互交流、协同攻关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平台。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学术支持措施并不一定能保证在较短时间里产生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这是因为学术研究尤其是创新性理论学说或概念的出现，是一

项具有很强个体性的研究工作，它们离不开个体研究人员创造欲望和写作热情的迸发，故其出现与流传有一定的偶然性。即便如此，打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加大对上合组织研究的支持力度等措施，对于扩大上合组织的研究队伍和提升上合组织的整体研究水平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指出的，既然学术概念的创新属于理论创新的组成部份，而且实现概念创新的难度相对而言要小，故我们可以首先着眼于上合组织研究的概念创新，然后再逐步实现理论学说的创新。结合上合组织的成立与发展过程提炼新的学术概念之所以重要，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学术概念是呈现和理解复杂社会现实和政治世界的语言工具；其二，学术概念是理论构建的基础和前提（如国际结构、本体论、认识论、软实力、声誉、承认等概念）；其三，学术概念往往具有政策涵义，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提出的学术概念涉及话语权之争，关系到行为体行为的合法性或正义性（如最近在西方政策界风行、用以诋毁中国崛起的“锐实力”概念等^①）。因此，我们可以先从学术概念的创新入手，逐步推进上合组织的理论创新。

然而，即使我们意识到学术概念创新的重要性，要真正提出一种新的学术概念并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也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指出的，我们在研究上合组织的过程中，除了“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等领导人提出的新理念，截至目前，上合组织研究者似乎并未提出几个广为流行的学术概念。事实上，这不仅体现在上合组织研究中，也体现在与上合组织研究密切相关的中亚研究中。相对于西方研究者创造了包括从“大博弈”到“新大博弈”（用以概括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从“心脏地带”到“地区安全复合体”（用以概括中亚地区的地缘重要性），从“转型国家”到“混合型政体”（用以界定中亚国家的政体类型），从“虚拟地区主义”到“防御性一体化”（用以形容中亚国家所开展的地区合作模式），从“颜色革命”到“混合型战争”（用来描述影响中亚国家政权稳定的各种威胁）等学术概念，国内学者在创造学术概念方面的能力则有待提高。

^①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6,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Juan Pablo Cardenal, Jacek Kucharczyk, Grigorij Mesežnikov, Gabriela Pleschová,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 December 4th, 2017; 胡钰、沈沁怡：《从“锐实力”概念演变看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与话语创新》，载《中国记者》2018年第4期，等等。

在具体阐述如何开展学术概念创新之前,我们仍需明确学术概念的几个特性。其一,物质实力的增强,并不会自动带来学术概念的提出和普遍流传。如当前中国的物质实力被视为稳居世界第二,然而,在学术话语权方面,中国仍面临“无法讲好中国故事”的窘境^①。而创新性学术概念的提出,是提升学术话语权的有效方式。尽管物质实力的提升与学术概念的创新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物质实力提升带来学术资源投入的增加,尤其是学术共同体基于国力增强带来的创新意识提升,使创新性学术概念出现的可能性增大。其二,学术概念有其自身的提出路径。能否提出创新性并得到广泛接受的概念,取决于学者的洞见、经验、创造力等因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就与其对该类实力与“硬实力”在构成要素、使用方式、运作模式和政治效果等方面差异的敏锐观察密不可分^②;至于“锐实力”概念的提出,尽管有拾人牙慧之嫌,但其受到“软实力”概念的明显影响是昭然若揭的。由此可见,创新型学术概念的出现,离不开学者们对现实世界和学术研究进展的深切把握,其间蕴含着研究者的学术洞见。其三,学术概念至少应以中立、客观、普遍的面貌出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对比较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一个新的学术概念要被研究者接受,往往不能具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或价值偏见,否则它将被视为政治术语而非学术概念(当然,追溯一个政治术语的起源流变则不同),从而阻碍其在学术共同体中的传播。就此而言,阎学通就国际领导权提出的“王道”与“霸道”概念与赵汀阳汲取中国传统思想智慧的基础上提出的“天下体系”概念都是值得借鉴的例子^③。这些传统概念经由学者们的学术演绎,获得了相对客观、中立、普遍的学术内涵,从而引发了中外学术界的讨论^④。

① 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王啸:《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等。

②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实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见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对阎学通观点的关注,见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eds., 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对赵汀阳“天下体系”概念引发的讨论,参见 Tingyang Zhao,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 (Tian-xia, 天下),” *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Vol. 12, No. 1, 2006, pp. 29-41;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p. 749-761; Chishen Chang, “Tianxia System on a Snail’s Horn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2, No. 1, 2011, pp. 128-142; Elena Barabantseva, “Change vs. Order: Shijie Meets Tianxia in China’s Interactions with the World,”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34, No. 2, 2009, pp. 129-155; Bijun Xu, “Is Zhao’s Tianxia System Misunderstood?” *Tsinghua China Law Review*, Vol. 6, No. 95, 2013, pp. 96-108, etc.

五 在上合组织研究中推进学术概念创新的三点建议

明晰了学术概念的基本特点之后，我们可以就如何在研究上合组织的过程中提出新的学术概念提供三点尝试性的建议：

第一，结合上合组织的实践创新提炼新的学术概念。根据学术概念具有“呈现和理解复杂社会现实和政治世界的语言工具”的功能，要对上合组织的这些实践创新予以恰当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可以根据其发展历程提炼出新的学术概念。如就上合组织的成立起步于安全合作而非经济合作，这一有悖于西方地区合作理论基本观点的经验事实，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地区合作模式”或“安全驱动的地区合作模式”。针对作为上合组织指导理念的“上海精神”，由于其在承认国家主权的同时强调尊重国家间的文化或文明差异（尊重国家主权，实现了“薄的承认”原则，而尊重国家特性和文化差异属于“厚的承认”），从而有悖于“文明的冲突”论题，我们可从承认理论的角度解释“上海精神”，并将其称为“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理念”^①。在成员国构成上，上合组织既有大国又有小国，既有民主国家又有“威权国家”，然而它们却有效地维持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对于这一超越了“民主和平论”对国家间关系描述的现象，我们同样可以从承认理论的角度予以诠释，因为这体现了上合组织尊重成员国政体类型差异，不强求甚至不推崇国家政权性质同一的特点（属于“厚的承认”）。至于上合组织强调协商一致的运作方式和大国自我克制、较小成员国积极参与并对大国予以适当尊重的相处方式，这一实践创新同样反映了各国基于“承认”原则实现组织团结的地区合作经验。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将上合组织的地区合作模式称之为“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因为“上海精神”体现了力图使成员国在合作中同时给予彼此“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的原则；而“安全先行”的创建经验和大小成员国相互尊重的合作经验，则是对“上海精神”这一“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理念”的实践或落实。当然，这只是从一种特定的理论角度（承认理论）剖析上合组

^① 关于承认理论，可参见阿克塞尔·霍纳特：《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Thomas Lindemann, *Causes of War: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Colchester: ECPR Press, 2010；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Paradigm, 2011；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曾向红、邹谨键：《反恐与承认：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

织的地区合作实践，人们也可以从其他角度创造新的学术概念。总而言之，基于上合组织的实践经验并对这些实践创新进行有效的总结和解释，是提炼出创新性学术概念并得到认可的基本要求。

第二，必须避免简单的模仿与粗糙的改造。由于学术概念具有自身的逻辑理路和思想渊源，因此，在创新学术概念的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仅仅对类似概念作简单的修正。这方面的消极例子是国内学术界各种“陷阱”概念的流行，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对“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简单模仿和套用^①。大多数的“陷阱”概念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它们所提炼或概括的只是一种特殊现象，并没有太多的普遍意义。而“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之所以流行，与其指出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实力差距的缩小会导致战争爆发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有关^②。尽管“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对历史史实的理解或许存在争议^③，但无论是认可还是反对这一观点，学术界依旧需要严肃对待其指称的国际关系现象^④。

换言之，概念创新的必要性在于，人们无法根据现有概念来描述或解释一类普遍现象，或者它们难以对这些现象予以充分、准确的解释。由此可见，在就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新的学术概念时，我们在集中研究上合组织的同时还必须超越上合组织，即须将其与国际关系中的地区合作这类普遍的国际关系现象衔接起来，在特殊性中发掘普遍性，这是“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流行给予我们的正面启示。而概念创新无效的负面案例，除了形形色色的“陷阱”概念，还有“锐实力”概念。“锐实力”本质上是无效的。因为该概念只是对“软实力”概念的简单改造，更关键的是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从而自相矛盾——指责中俄等非西方国家通过价值观等非物质手段拓展影响力被视为使用“锐实力”，而西方国家如此行为则是发挥“软实力”^⑤。“锐实力”概念的荒唐之处在于其贯彻的是双重标准，这使其沦落为一个政治术语或政治标签。“修昔底德陷

^① 对各种陷阱概念的批评，参见阎学通：《主编寄语：造词≠学术创新》，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

^②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New York: Houghton, 2017.

^③ 参见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何元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吴晓群：《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希腊城邦政治与“修昔底德陷阱”》，载《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4期，等。

^④ 此类成果很多，参见蔡翠红：《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等。

^⑤ 王新影：《西方语境下的“锐实力”概念解读及应对》，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9期。

阱”概念的价值与“锐实力”概念的失败，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使创造的学术概念具有普遍性，同时要尽可能避免受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符合这些标准。这一概念不仅能够有效地概括上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经历，而且有助于理解其他主要由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地区合作组织，如东盟等^①。

第三，学术概念的推广有赖于学术共同体与政界的协同合作。学术概念的提出虽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努力，但其传播与推广则不然。一个创新性学术概念的传播和热议，首先有赖于一个健全和活跃的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和支持。就此而言，打造和完善国内现有的中亚问题学术平台，建立健全上合组织学术交流机制至关重要。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成员国之间形成一个跨国学术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成员国学者可以就涉及上合组织学术概念的学术价值、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交流，争取让学术概念得到支持和扩散。自2017年下半年“锐实力”概念出现之后，该概念经历了一个迅速传播的过程。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1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下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纠集了波兰、斯洛伐克等国以及拉美研究者发布的一份题为《锐实力：威权国家影响力的崛起》的报告^②。此后，“从《经济学人》《外交事务》到新闻网站布赖特巴特（Breitbart）等各类西方媒体纷纷对‘锐实力’进行跟随炒作，学者名人也针对这个空洞的话题大发议论，在知识界渲染了抱虎枕蛟的危机感”^③。尽管“锐实力”概念的流行不过是西方媒体、学者、政客操控舆论的结果，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跨国学术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性^④。

① Bahar Rumelili, *Constructing Regional Community and Order in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Chapter Three; Joko Gunawan and Yupin Aunguroch, “ASEAN Mutu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 for Indonesian Nurses: Is it a Promi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Vol. 2, No. 2, 2015, pp. 77–80, etc.

② Juan Pablo Cardenal, Jacek Kucharczyk, Grigorij Mesežnikov, Gabriela Pleschová,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③ 王维佳：《识别一个新的旧世界——关于“锐实力”报告的评论笔记》，载《对外传播》2018年第4期。

④ 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无法就“锐实力”概念的思想渊源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可以简要提及的是，该概念与西方学术界热衷讨论的“竞争性威权主义”“混合型整体”等政治学概念的讨论密切相关。参见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2002, pp. 51–65; Matthijs Bogaards, “How to Classify Hybrid Regimes? Defective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tization*, Vol. 16, No. 2, 2009, pp. 399–423;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etc.

此外，除了学术界的支撑，政界对特定学术概念的接受和推广也至关重要。当前美国启动的对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大选的调查闹剧、澳大利亚以中国干预其国内政治为由渲染“中国威胁论”等动向，与西方政界对“锐实力”概念的理解和接受存在紧密联系。事实上，“锐实力”概念的风行，契合了西方政界对俄罗斯干预西方国家政治和中国通过孔子学院等机构拓展软实力所引发的恐惧，从而为西方政客们采取针对中俄的各种限制性措施提供了学术概念工具。另一个学术概念得到政界支持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官方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提出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s）概念的挪用。2017 年 12 月，美国在其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责中俄为“修正主义大国”，认为两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一案例中，学术概念被政府直接挪用，为其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学术正当性^①。“锐实力”与“修正主义国家”这两个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仅有学者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要时它还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西方为维护自身而蔑视他者，甚至不惜借鉴学术概念并操纵舆论对中俄进行攻击，面对这一情况，我们也需要官方对学术界提出的重要概念予以支持，必要时进行推广，这是进行有效反击并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式。

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发现，学术概念的创新不仅是提高上合组织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实现上合组织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而结合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将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提炼为一种“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该模式不仅能较好地解释上合组织在实践方面的创新，而且也可运用到对其他地区合作组织的分析中。换言之，“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虽源自于解释上合组织发展这一特殊的国际关系现象，但它具有普遍意义，有较好的推广价值和拓展潜力。虽然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但“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这一上合组织经验，能为实现关于上合组织的理论创新提供必要的概念基础。至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创新，除了创新性的学术概念，还需就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提炼出新的理论命题，最重要的是将上合组织纳入国际组织与地区合作的整体研究之中，并使之成为一个自足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根据目前国内国际学界对上合组织的研究现状，实现上合组织研究的重大理论创新，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对“修正主义国家”概念的深入批判，见温尧：《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载《外交评论》2017 年第 5 期。

总 结

在理论创新方面，尽管上合组织本身提出的许多合作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但学术界要实现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可选择从学术概念的创新入手，逐步推进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鉴于学术概念创新具有自身的提出路径和逻辑理路，在此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要使提炼出的学术概念能有效反映上合组织在实践层面的创新；要避免简单的模仿，而要体现出独创性，并使概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学术概念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之后，政界有必要对学术概念的创新予以必要的支持。根据学术概念创新前两个方面的要求，或许我们可以用“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来概括上合组织的发展经验。至于如何基于这一概念实现上合组织研究的理论创新，学术界可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或研究。

最后仍需说明的是，这里着重讨论上合组织在学术研究层面如何实现理论创新，至于如何实现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之间的转化，仍是一个有待进行探讨的问题。强调学术界创造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学术概念，并不意味着政策话语或政治术语无法转化为学术概念。事实上，马克·兰特根有关上合组织早已是一个“安全共同体”，并且有望成为一个“地区共同体”的判断，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呼吁各成员国共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宣示，似乎是在不经意间呼应了兰特根的研究。尽管兰特根在其研究中并未对何谓“地区共同体”予以详细的说明，其意与“命运共同体”有何异同也不明确；但其研究的启示在于，或许可以将“安全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与“命运共同体”这一政治术语接续起来，将其与上合组织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当学术界对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以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利益共同体——这三个概念作出清晰、明确的界定，并深入研究三者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演进动力，那么构建起一种关于上合组织的理论学说或许是可能的。如此一来，“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将不再只是一种政治愿景，而有可能成为实现理论创新的概念基石。这一愿望的实现，则取决于国内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 胡 冰）